

香港工作场所中三语使用情况的再调查^{*}

梁慧敏

提要 本研究计划是对 2009 年所做的香港社会三语使用情况调查的五年回顾。2014 年的课题目标是通过问卷调查搜集数据,从使用量上考察五年来香港各种非工作和工作场合中,粤语、英语和普通话使用情况的变化趋势,以及不同因素对这三种语言使用频率的影响。整体研究结果显示,五年来三语呈现出了较有规律的变化,粤语使用大体呈小幅度下滑趋势;英语和普通话的使用频率则有所上扬。若从细微处着眼,受访者的社会背景也对某些场合的语言使用有不可小觑的作用。对于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本文将结合图表详细说明。期望此次语言调查可以为语言政策的反思和更新提供新的参考。

关键词 香港;粤语;英语;普通话;语言调查;五年回顾

1. 引言

“两文三语”(中文、英文;英语、普通话、粤语)是香港特区政府既定的语文政策,自 1997 年起在香港推广已十七年,为此政府投放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这些年来香港社会的语言使用究竟是否因语言政策的推行而有相应的变化呢?为了了解这三种语言在各场合的具体使用情况,以期检查这些资源投放是否合理,2009 年作者和香港教育学院的李贵生博士共同主持了名为“香港三语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一千余名香港本地或常驻居民接受了访问。通过对他们日常生活中三语使用频率的分析,我们发现,在香港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粤语的使用量远远高于其他语种;而且即使是在工作场合中,粤语也稳居第一。(李贵生、梁慧敏,2010)时隔五年,香港的政治、社会、经济结构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文化因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信亦会有所变化。为了与 2009 年的调查数据比对,2014 年我们采用相似的随

^{*} 本研究得到香港理工大学研究项目“香港语言使用的社会语言学调查:五年回顾”的资助,项目编号为 G-UC63。此外,研究助理郑秋晨女士为前期调查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王莎女士帮忙为本项目搜集资料和整理数据,在此一并致谢。

机采访的方式,再一次对香港的三语使用情况做了新一轮调查。这部分数据就是此次调查的主体数据。

2014年研究团队在九龙、香港岛和新界进行了有关的访问,共收回有效问卷1001份,受访者的特征和在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比率都有我们的调查员如实记载。下文会先介绍本研究的调查设计及两个年份的数据采样,再从总体和细节上对比两组样本的相同和不同点。我们希望这些讨论能为相关的政策部门和将来有意进一步做同类调查的同行提供一些参考。

2. 调查的目的与方法

2.1 研究背景及比对样本介绍

语言惯常使用情况一直是政府人口普查中人口特征部分的一个重要项目,根据政府的调查资料,我们可以得知香港社会主要语言的使用概况,表1是2001年—2011年十年间香港五岁及以上人口惯用语言的人数和比例(香港政府统计处2011):

表1 香港政府统计处统计的惯用语言表

惯用语言	2001		2006		2011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广州话	5 726 972	89.2	6 030 960	90.8	6 095 213	89.5
普通话	55 410	0.9	60 859	0.9	94 399	1.4
其他中国方言	352 562	5.5	289 027	4.4	273 745	4.0
英语	203 598	3.2	187 281	2.8	238 288	3.5
其他	79 197	1.2	72 217	1.1	106 788	1.6
总计	6 417 739	100.0	6 640 344	100.0	6 808 433	100.0

注:这些数字不包括失去语言能力的人士。

这些数据宏观地勾勒出香港语言使用的基本面貌,让我们对本地几种惯用语言的使用人数及其所占比例和大致的走向有了一个概括的认识。可惜这类调查并没有顾及不同情况下的语言使用问题,须知惯用一种语言不表示不会说另一种语言,譬如一个惯用广州话的人在特定的场合也须使用英语或普通话交谈。而且政府的惯用语言调查也未结合其他因素,例如教育程度、年龄、从事行业等,以进行交叉比较,以致我们无法获得更为详尽的数据,也很难就特定的语言群体或现象有进一步的分析。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早于2009年便在过去粤语调查成果的基础上,分非工作和工作场合两大类对香港工作阶层的三语使用作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和分析,得出了一些可供教育系统和语言政策机构参考的结论(李贵生、梁慧敏,2010;梁慧敏、李贵生,2011;Lee & Leung,2011)。五年后,香港社会发生了不少转变,例如经济结构在变化,自由行游客的增加对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有了新的语言要求;市民对于粤语的热情也在“撑粤语”

的方言保护活动中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社会各界对香港社会的语言变化有一定预设,然而却缺乏相应的数据支持。究竟这些年来本地语言使用变化的广度和深度是怎样的,趋势又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真确的数据来回答。因此本研究认真参考了过去的调查结论,于2014年再次审视三语在香港的实际使用情况,希望能为相关的学术研究或政策讨论提供全新的资料。

2.2 问卷设计

为更好地比对2009年及本年度的数据样本,本研究依旧采用随机的问卷方式搜集数据,于2014年5至6月期间派员到九龙、新界和香港岛共8个点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由定量和定性两类问题组成,有效问卷共1001份,事后检验三区的样本也基本符合香港统计处发布的人口分布情况。对于受访者的的人口特征,则主要采取定性访问的方法;而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则以度量的方式完成。

调查问卷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调查对象的一些背景数据,包括他们的母语、定居最久的城市、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类别以及职位阶层等。

第二部分主要针对工作场所与非工作场所的语言使用情况。非工作场所包括与家人交谈,与友人闲谈,外出购物,在公共场所用餐,收看或收听电视剧、电视新闻或者收听电台广播,参与文娱康乐活动(如唱歌、看电影、舞台剧、歌剧等)等场合下所使用的语言及其频繁程度,而工作场所则包括与同级交谈、与上级交谈、与下级交谈、与其他机构或企业进行业务上的交往、与工作服务对象交谈、进行单位小组会议、在工作场所闲谈以及到政府机构办事等场合下所使用的语言及其频繁程度。频繁程度以0至5分为评量标准,当中最常使用者为5分,较常使用者为4分,一般情况下使用者为3分,较不常使用者为2分,最不常使用者为1分,从不使用者则为0分。由于本文的重点是工作场所中语言使用的情况,因此非工作场所的数据仅作参考或比较之用。

第三部分涉及对粤语的语言态度问题,包括哪种语言最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粤语在香港的重要性、学习和掌握粤语的用处以及希望自己的粤语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等问题。选项亦按程度划分,最高分为5分,表示非常重要,4分表示较重要,3分表示一般,2分表示较不重要,1分表示非常不重要,0分表示根本不需要使用亦可。第一和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数据来源,第三部分数据则将留待另文讨论。

3. 调查结果概述

3.1 基本数据

本研究于2009年和2014年分别访问了1004人次和1001人次,以下是两次问卷调查受访者的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和职级的分布。

表2 受访者基本数据

分类统计	年份 分类统计	2009		2014	
		计数	有效百分比	计数	有效百分比
性别	男	526	52.4%	593	59.4%
	女	478	47.6%	405	40.6%
最长居住地	香港	947	94.3%	948	94.9%
	内地/台湾/澳门	20	2.0%	34	3.4%
	海外	34	3.4%	17	1.7%
年龄	18岁以下	63	15.4%	10	1.0%
	19~30	533	42.3%	395	39.5%
	31~40	200	30.8%	277	27.7%
	41~50	146	7.7%	211	21.1%
	51岁以上	62	6.2%	107	10.7%
母语	粤语	974	97.4%	958	95.8%
	英语	7	0.7%	6	0.6%
	普通话/其他方言	19	1.9%	32	3.2%
	双语	0	0%	4	0.4%
教育程度	小学	23	2.3%	31	3.1%
	中一~中五	360	35.9%	384	38.7%
	中六~专上	135	13.4%	187	18.8%
	大学	413	41.1%	305	30.7%
	硕士	63	6.3%	80	8.1%
	博士及以上	8	0.8%	5	0.5%
职业类别	行政管理人员、高级行政 人员及自雇人士	59	5.9%	83	8.4%
	专业人士、辅助专业人士 及中层管理人员	314	31.3%	335	33.7%
	一般文职、技术工作及非 技术工作	629	62.8%	575	57.9%

参考2009年的样本数据,2014年受访者的年龄特征与前一次大致吻合,但也可以看到一些细微的变化。首先是内地居港人数有所上升,相应地以普通话或其他汉语方言为母语的比列也有所上升(从1.9%到3.2%);与之相反的便是海外或惯用英语人数的轻微滑落(从0.7%到0.6%)。另外,我们观察到今年受访者的年龄分布较2009年平均,而且职场年长者的比例

也有较大的增幅(51岁以上从6.2%到10.7%)。教育程度方面,中五至大学学历仍旧是本地职场的中流砥柱,但大学学历的人数却有一成的下滑(从41.1%到30.7%),而专上学院(副学士、高级文凭、专业证书等)入职人数则有增加,相信这与本港教育局近年积极推广的新学制有关。其余项目大体接近香港整体人口的比例。

3.2 工作场所与非工作场所的比较

了解受访者的基本数据后,现在可以看看调查的初步统计。下图是两个年份粤语、英语和普通话在非工作场合与工作场合总使用频率的均值分布情况,其中2014年的数据由条形图表示,2009年的平均值由线条图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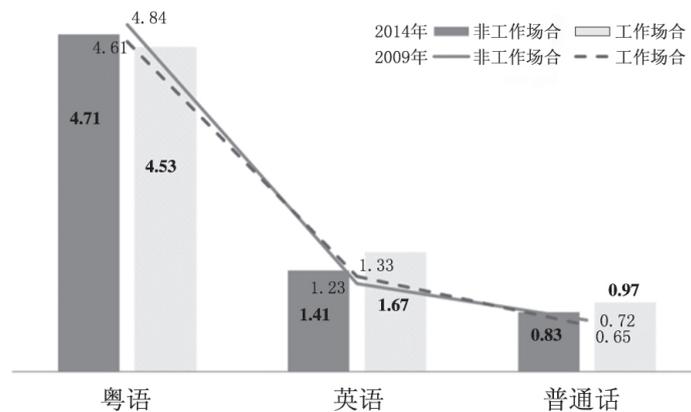


图1 2009年和2014年三语在非工作场合与工作场合的均值

图1显示,虽然2014年较五年前非工作场合和工作场合粤语使用平均值分别下滑了0.13和0.08,但是粤语作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在非工作和工作场合的地位依然很稳固,接近“最常使用”的程度;排第二的英语和第三的普通话则都处于上升的状态。英语的升幅分别是0.09和0.34,在基数并非很大的情况下,英语的使用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总体均值仍然介乎“最不常使用”至“较不常使用”之间;普通话的均值有一定提升,分别提高了0.11和0.32,但总体均值仍未能突破1分(最不常使用)大关。

三语之中,粤语的均值遥遥领先于其余两种语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五年前相比,2014年普通话在工作场合中的使用频率(0.97)高于非工作场合(0.83),说明普通话已经慢慢开始作为一种工作语言,在香港职场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而英语在工作使用上的增加则恰恰说明它在工作场合中的确有独特功能,尤其是在高层精英领域,而且这一重要性不降反升。

假如要进一步了解三语在非工作与工作场合中各种处境的使用情况,可参照以下的分项列表:

表3 全部样本三语使用均值分布

	分类数据		2009年	2014年	增减		分类数据		2009年	2014年	增减
非 工 作 场 合	与家人 交谈	粤	4.90	4.82	-0.08	工 作 场 合	与同级 交谈	粤	4.73	4.66	-0.13
		英	0.57	0.94	0.37			英	1.18	1.59	0.41
		普	0.39	0.65	0.26			普	0.57	0.87	0.30
	与友人 交谈	粤	4.93	4.80	-0.13		与上级 交谈	粤	4.53	4.49	-0.13
		英	0.99	1.35	0.36			英	1.24	1.67	0.43
		普	0.59	0.87	0.28			普	0.37	0.60	0.23
	购物 用语	粤	4.97	4.90	-0.07		与下级 交谈	粤	4.77	4.73	-0.04
		英	0.41	0.79	0.38			英	0.66	0.99	0.33
		普	0.21	0.48	0.27			普	0.39	0.64	0.25
	公共场所 用餐	粤	4.97	4.89	-0.08		与业务 对象交谈	粤	4.43	4.41	-0.02
		英	0.43	1.02	0.59			英	1.72	2.13	0.41
		普	0.16	0.38	0.22			普	0.83	1.31	0.48
	收看电视 收听广播	粤	4.79	4.49	-0.30		与服务 对象交谈	粤	4.61	4.40	-0.21
		英	2.49	2.20	-0.29			英	2.00	2.15	0.15
		普	1.44	1.32	-0.12			普	1.43	1.75	0.32
	文娱康乐 活动	粤	4.47	4.36	-0.11		会议语言	粤	4.53	4.51	-0.04
		英	2.53	2.25	-0.28			英	1.22	1.61	0.39
		普	1.54	1.32	-0.22			普	0.37	0.70	0.33

从表3可见,2014年粤语在非工作和工作场合都维持着惯常语言的地位。但其使用量在每一个单项都有小幅滑落,收看电视、收听广播的粤语使用平均值为最大降幅,为负数0.30。相比粤语的总体下降趋势,2014年普通话和英语除在娱乐休闲活动场合外,都稳步上升,用餐场合英语甚至有0.59的增幅;而在工作场合,英语在同级交谈和与上级交谈中地位有较明显提升,均超过0.40;普通话增幅最大的是与业务对象交谈一项,而与同事的沟通用语上也有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的调查中,普通话有两项平均值超过了1分,分别是与业务对象(1.31)和服务对象交谈(1.75),后一项的均值已经从五年前的“最不常使用”向现在的“较不常使用”靠拢。可以想见,随着与内地交流的不断加深和持续增加的内地顾客数目,在服务领域熟练使用普通话的工作人士会保持稳定的增幅。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在电视和文娱两项上,粤、英、普三语在香港市民的休闲生活中所占比例都有较明显下降。据我们调查所得,下降原因之一应为日韩文化节目在港的持续升温所致。从数字上看,共有49人次收看其他语言电

视、电台节目。其中收看日语电视节目的 16 人,韩国电视节目的 21 人,日韩都收看的 6 人,其他语种 2 人;而在文娱项目上,情况也类似。共有 16 人会在休闲时间观看非英文的外语节目,其中选择日语的共 8 人,韩语 3 人,日韩语 5 人,其他语种 3 人。

要深入理解这些数据的意义,我们还可以结合受访者的基本数据,看看性别、年龄、教育和职级等变项因素对三语的使用到底有什么影响。

4. 工作场所语言使用的变项比较

4.1 性别

由于所需要检验的因子差异较大,所以本节将就因子特征采用社会科学统计程序(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s,简称 SPSS)软件中的独立样本 t 检验(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单因子变异数分析(One-Way ANOVA)和非参数多个独立样本检验(K Independent Samples)三种数据分析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初步比对;之后,多重比较的(Post Hoc Multiple Comparisons)LSD 和 Tamhane's T2 方法会帮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各项组间差异的具体分布。当显著性小于 0.05 时,表示影响因素均值上存在显著差异;相反,当显著性大于 0.05 时,即表示差异并不显著(尹海洁、刘耳,2008;余民宁,2005)。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性别对于工作场合的三语使用率分布影响最小。与业务对象用英语交谈这一项小于 0.05,如下表所示:

表 4 受性别因素影响显著的变项 t 检验

	均值		t 检验		
	男	女	t 值	p 值	结论
业务对象英语	2.27	1.92	2.870	.004	有显著差异,男>女

由于性别只有两个选项,所以这里采取的是独立样本 t 检验的方式,收入表中的 t 检验值分别为 t 值和表示显著性的 p 值。 t 值若为正数,则表示男性样本均值大于女性样本;若为负数,则表示女性均值在该项指标上大于男性均值。 p 值为双尾显著性指标,若指标小于 0.05,则表示男女在该检测指标上有显著的差异,参考男女均值,可以得知哪个性别处于明显的优势。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得出表 4 各项数据,通过分析,本研究所收集的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只在上述与业务对象交谈一项指标上有显著性的差异。在这一场合男性更常使用英语。在我们收回的 1001 份问卷中,业务中英语使用量大于 1 分的受访者中男性占 64.9%,近乎三分之二,女性仅占 35.1%的比例。

表 5 男女在与业务对象交谈项目中的数字统计

	男		女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业务对象英语	401	64.9%	217	35.1%

相较之下,年龄、教育程度和职业性质对工作场合中的三语使用,无疑有较明显的影响,值得多作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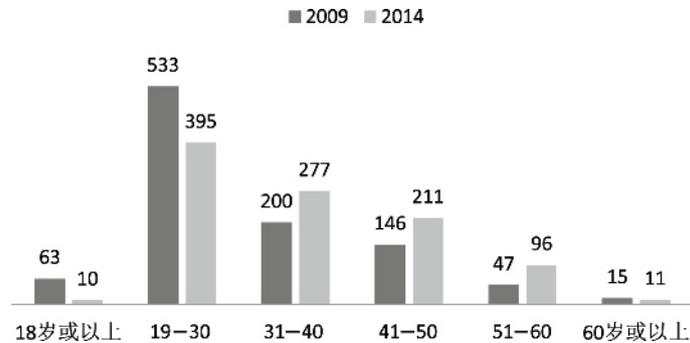


图2 2014年受访者年龄分布及与2009年的差异

4.2 年龄

由上面的统计图可以发现,2009年和2014年受访者的年龄区划大致一致,以19~60岁为主体,18岁以下和60岁以上最少。19~50岁组别依然是职场的主体。但与2009年相比,19~30岁组别的受访者有所减少,而31~50岁组别的数字则略微上扬。

由于我们的研究目标是职场人士的三语使用情况,所以对年龄因子的检验会集中在19~60年龄段。

表6 受年龄因素影响显著的变项 *t* 检验

		K-S 检验 <i>p</i> 值	结论
工作场合	同级普通话	0.039	30岁以下<41-50
	上级英语	0.021	30岁以下>51以上年龄段
	业务对象英语	0.003	51岁以上<其他年龄段
	业务对象普通话	0.043	各年龄段间均有差距
	服务对象英语	0.000	51岁以上<其他年龄段
	服务对象普通话	0.007	51岁以上<其他年龄段
	会议粤语	0.048	51岁以上>其他年龄段
	会议英语	0.001	51岁以上<40以下年龄段
	会议普通话	0.032	31-40>30岁以下

以2014年的调查结果作为依据,上表是受年龄影响显著的数据报表,问卷中年龄作为分类选项共有6个小类,所以这里选用方差分析,如果样本符合同构型条件即使用单因素变异数分析,如果不符合,则参考非参数K-S独立样本检验。

首先,对所有观察值做方差齐性/同构型分析,要求显著性指标 >0.05 。若符合条件就运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如果显著性 *p* 值 <0.05 ,则相信该数据在年龄段有显

著差异,为更好观察数据,会用 LSD 方法一事事后多重比较。相反,如果不符合方差齐性要求,则参考非参数分析,同样,显著性指标为 0.05。事后多重分析则选用非假定方差同质的 Tamhane's T2 方法。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总体上英语使用受到年龄因素影响较多,其次是普通话,最后是粤语(只会议粤语一项)。数据显示,英语使用随年龄增加呈递减的总体趋势,特别是 51 岁以上组别,使用英语的机会明显较少;普通话在工作场合的运用虽然也受到年龄的影响,但并没有明显的轨迹可循。粤语则仅在会议场合有年龄区别,其中较长者比中青年人更多使用粤语,两者均值相差约 0.4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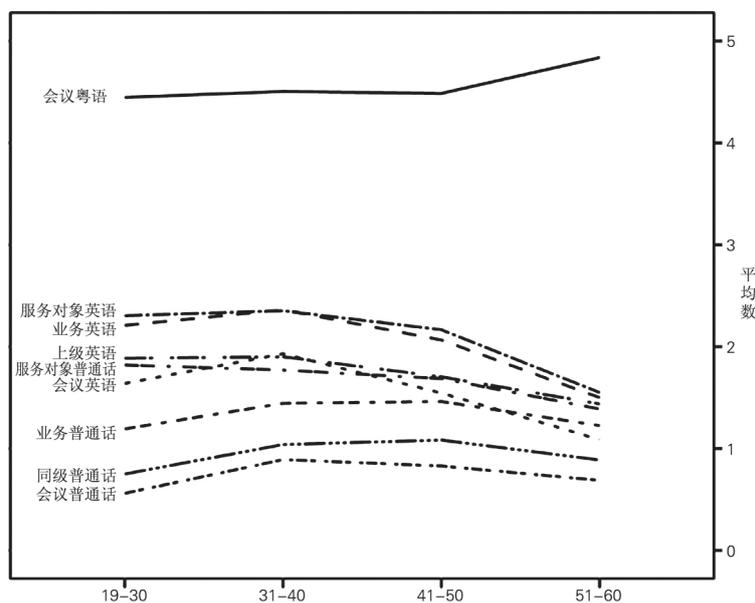


图 3 受年龄影响显著的变项

图 5 可以是上面分析的直观参考,图中的折线是各年龄段语言使用频率的均值。在工作场合,英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 31~40 岁年龄段,这也与这一年龄段工作人士的就职年限和学历水平等指标相符。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服务对象和业务对象交谈时使用到的英语和普通话均值是工作场合中最频繁的,反映了香港商业活动中的语言要求。

4.3 教育程度

2014 年的受访者中教育程度的分布与 2009 年的大致吻合,即教育程度为中五的 (38.71%) 和大学 (30.75%) 的人数居多,小学 (3.31%) 和博士及以上 (0.5%) 以上为最低。但两个年份的不同点也很明显,2014 年大学毕业的受访者比 2009 年少了约 100 人次,而中五及以上的人次有显著上升,另一个较大区别在于,本年度为数不少的受访者毕业于社区学院或专上学院(颁授副学士、高级文凭、专业证书),相信这也是中五以上就业人群增加的一个原因。由于两个极值的样本数太少,为了使得到的分析数据更加精确,小学和博士的受访人数将并入中

五以下和硕士以上两个组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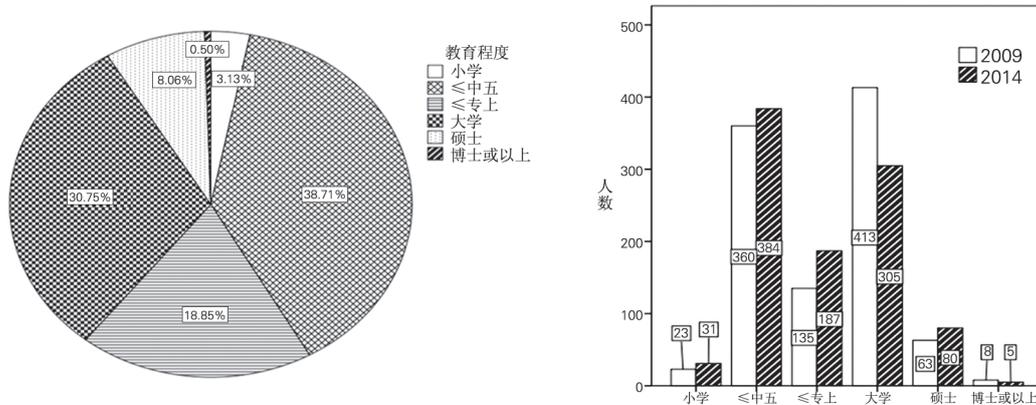


图4 2014年受访者教育程度分布及与2009年的差异

跟年龄因子的分析相似,教育程度对语言使用的分析也是首先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非参数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在得到显著性指针后再对数据做组内多重比较。2014年的调查显示,除了服务普通话一项外,教育程度的高低对多数工作场合的三语使用都带有明显的影响。以下是教育程度对各变项影响力的数据报表。

表7 教育程度对各变项的显著性影响

		K-S 检验 p 值	结论
工 作 场 合	同级粤语	0.000	中五及以下>其他教育程度
	同级英语	0.000	中五及以下<其他教育程度
	同级普通话	0.001	硕士及以上>其他教育程度
	上级粤语	0.000	中五及以下>其他教育程度
	上级英语	0.000	中五及以下<其他教育程度
	上级普通话	0.002	中五及以下<大学及以上
	下级粤语	0.000	中五及以下>大学及以上
	下级英语	0.000	中五及以下<大学及以上
	下级普通话	0.017	中五及以下<大学程度
	业务粤语	0.000	中五及以下>其他教育程度
	业务英语	0.000	随教育程度递增
	业务普通话	0.000	中五及以下<其他教育程度
	服务粤语	0.000	专上及以下>大学及以上
	服务英语	0.000	中五及以下<大学及以上
	服务普通话*	0.872	教育程度间无明显差距
	会议粤语	0.000	专上及以下>大学及以上
	会议英语	0.000	中五及以下<大学及以上
	会议普通话	0.000	中五及以下<大学及以上

* 受教育程度因子影响的显著性大于 0.05 者

由上表可以看到,中五及以下和硕士及以上两个教育层大致是两个分水岭,这一特点在粤语和英语的使用比例上尤为突出。总的说来,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访者使用英语的频率越高;与之相反的是,教育程度较低者在非工作和工作环境中都较多使用粤语。普通话则以大学以上教育程度作为分水岭,特别是硕士及以上人士使用普通话的频繁程度较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香港的大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已接受九年普通话的教学,另一方面在于香港各大专院校基本上都设有普通话选修课程,有些大学专业课程更将普通话列为必修课,故大学生在听说方面均呈进步趋势(祝新华,陈瑞端,温红博 2012)。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它们的差异,可以参考下面的组合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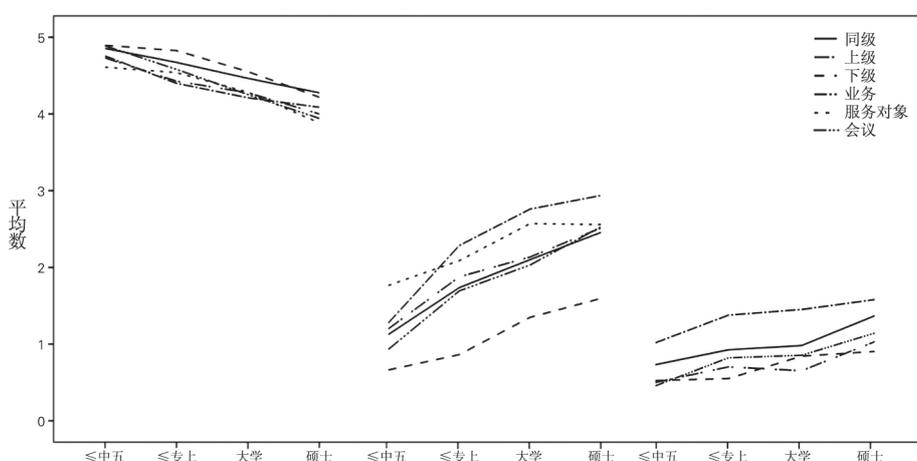


图5 工作场合受教育程度影响显著的变项

从图7可见,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工作场所中三语的使用,呈现较为稳定和明确的趋向。其中最容易发现的特征是,粤语与英语的使用有背驰的情况。也就是说,教育程度愈高,在工作场所中使用粤语的机会便愈少;相反,教育程度愈高,使用英语的情况却会增多。

大体而言,工作场所中语言的使用,普通话与粤语的使用同样有相似的趋势亦即教育程度愈高使用普通话的机会愈多,反之则倾向用粤语。相较之下,英语和普通话的使用分别在于,受访者的教育程度愈高,他们使用英语的机会不但会增多,甚至连使用的均值亦有实质性的提高。这些受访者使用英语的均值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接近3(即一般情况下使用者),甚至可以接近4(较常使用者)和5(最常使用者)。然而,普通话的使用机会虽然增多了,但均值却仅仅介乎0—2之间,属“从不使用”与“较不常使用”的范围。

4.4 职业性质

2014年的调查参考了香港政府2011年人口普查的行业划分标准,经分析后我们所采集样本的职业分布与上述全港性人口普查大致相同。由图6中的数据可以看到,进出口、批发及零售业是从事人口最多的行业,建造业的从业人数则相对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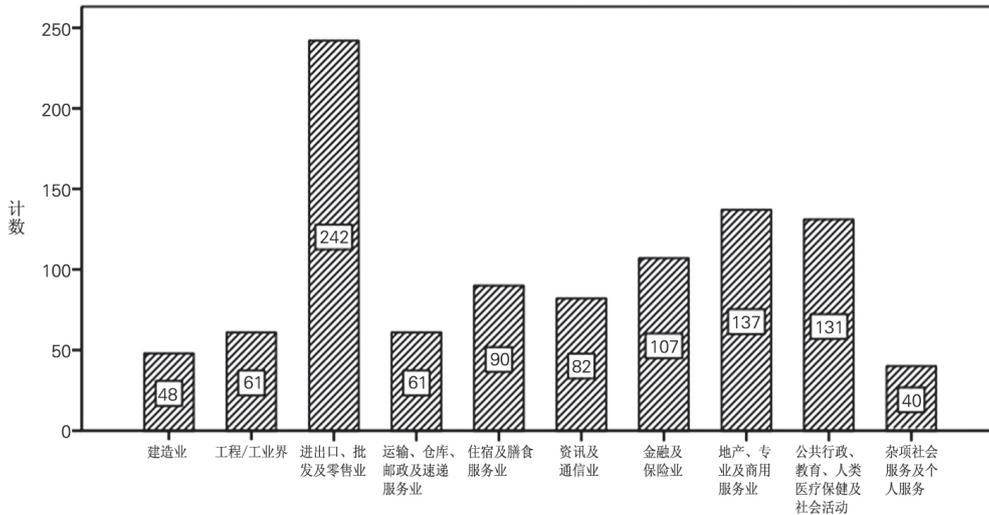


图6 2014年受访者的职业分布

2014年受访者的职业类别比例也与2009年大致吻合,即一般文职、技术及非技术人员占多数(57.91%),其次是专业人士、辅助专业人士及中层管理人员(33.74%),最后是行政管理人员及高级行政人员(8.36%)。比较2009年,本次受访者中低级工作人员有所减少(从629到575人),相对的中级(从314到335人)和高级工作人士(从59到85人)数目有小幅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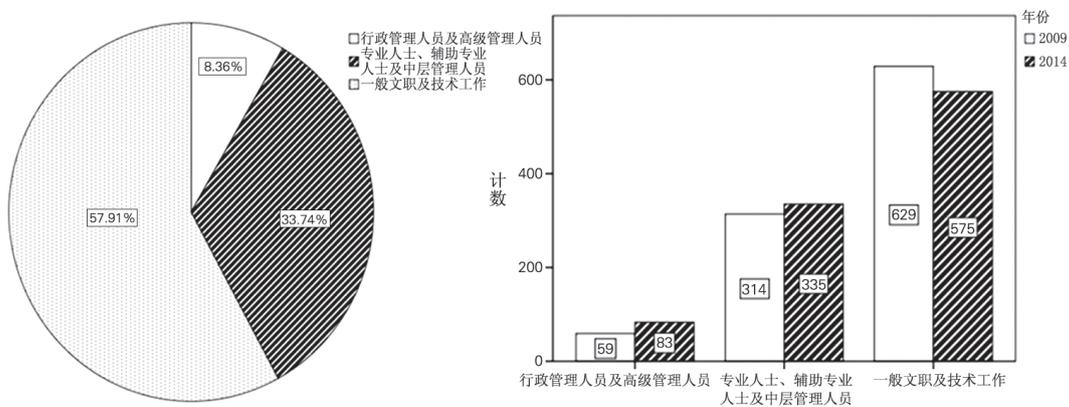


图7 2014年受访者职业类别分布及与2009年的差异

与教育程度的情况相似,除个别项目,职业性质对三语都有较大的影响。以下先列出职业性质对各工作场合中三语使用的显著性数据,为使表格数据更简明,这里用职级一至三分别代表行政管理人员及高级行政人员、专业人士、辅助专业人士及中层管理人员和一般文职、技术及非技术人员。

表 8 职业性质对各变项的显著性影响

		K-S 检验 p 值	结论
工 作 场 合	同级粤语	0.000	职级三 > 其他职级
	同级英语	0.000	职级三 < 其他职级
	同级普通话	0.016	职级之间无明显差异
	上级粤语	0.000	职级三 > 其他职级
	上级英语	0.000	随职级高低递减
	上级普通话*	0.103	职级三 < 职级一
	下级粤语	0.000	职级三 > 其他职级
	下级英语	0.000	职级三 < 其他职级
	下级普通话	0.001	职级之间无明显差异
	业务粤语	0.000	职级三 > 其他职级
	业务英语	0.000	职级三 < 其他职级
	业务普通话	0.000	随职级高低递减
	服务粤语	0.000	职级三 > 职级一
	服务英语	0.000	随职级高低递减
	服务普通话*	0.358	职级一 > 其他职级
	会议粤语	0.000	职级三 > 其他职级
会议英语	0.000	职级三 < 其他职级	
会议普通话	0.001	教育程度间无明显差距	

* 受职业性质因子影响的显著性大于 0.05 者

由上表可以看到,总体上,较低职级和中高职级的差异较大,而中高职级之间并没有太明显的不同。工作场合的三语使用量受职级影响的总体趋势是:低职级使用粤语交谈的比例大于其他两个职级,中高职级则较多地使用英语和普通话。至于职业性质到底对各单项有哪些影响,或者是这些影响究竟呈现出哪些趋势或形态,可以参看下面的图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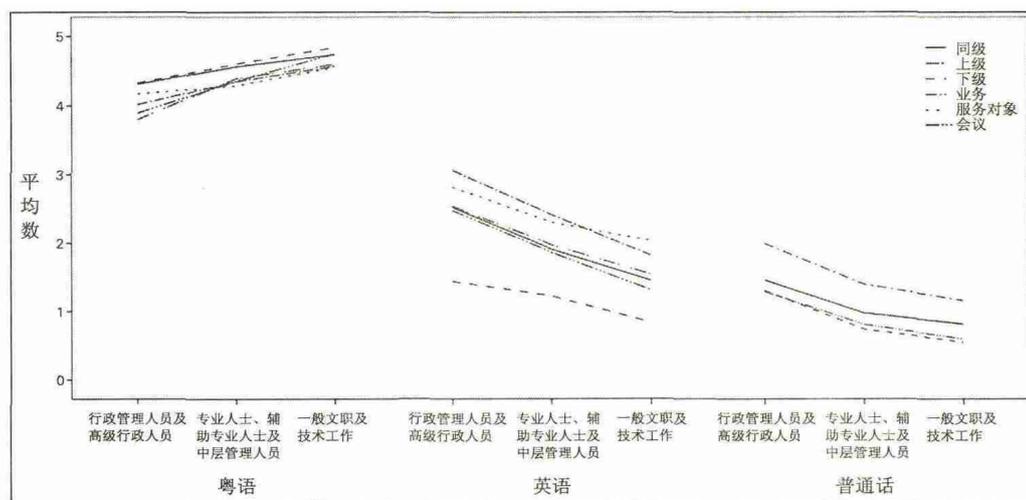


图 8 工作场合受职级影响显著的变项

上图显示,职位愈高或者职业性质愈是专门的受访者,在工作中使用粤语的机会愈少,而他们运用英语和普通话机会却愈多。这种背驰的现象似曾相识,与教育程度对三语运用的影响几乎如出一辙。不过必须留意的是,职级高低对工作场合三语使用的影响比年龄和教育程度更加的稳定,可预测性亦较多。

总的来看,粤语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使用频率都最高。英语排第二位,但在工作场合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普通话在两个场合都排在英语和粤语之后,不同教育和职业背景人士在工作场合使用普通话的表现迥异。普通话的使用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性质影响较大,而且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与2009年不及1分(最不常用)相比,2014年的总体均值开始向1分靠近,而且有多个单项已经超过1分(较不常用)。这些资料无疑可以加深我们对香港三语情况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思考香港语文政策和语文教育方面的问题。

5. 小结

对照2009年的语言调查,2014年所得数据使我们对五年来香港的语言使用变化有更清晰的了解。除个别场合外,粤语在生活和工作场合中的使用都有小幅度的下降,而英语和普通话则有上升的趋势。此外,我们也看到三语在不同场合因应说话人的年龄、教育背景及职业差异而出现频率上的差别。在工作场合中,粤语仍占主导地位,而英语和普通话的分工却日趋明显,各自在不同的领域或范畴有较突出的发展,英语在高端工作方面的地位不可撼动,而普通话则在服务行业展现正向的发展势头。问卷所得到的数据一方面印证了学界对香港语言使用变化的一些推测,给这些预测提供了更为详实的量化指标。另一方面,调查也让我们可以对香港社会语言的持续发展有了较贴近现实的预计:虽然英文和普通话在工作场所语言应用上所占比例仍然远远小于粤语,但如果按此上升趋势发展,这两种语言将来成为工作通用语言的可能性则更加乐观。最后,就语言政策制定和教学内容选择的层面,我们的调查也提供了可靠的信息和启发;同时也为即将进入职场或转换工作的人士提供参考,帮助他们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语言软性技能培训。李贵生(2006)很早就呼吁,特区政府应像制定经济或交通等政策一样审时度势地制定语文方面的政策,而本计划在2009年和2014年两个年份的调查,都以数据分析为依据具体地回应了这一命题。

参考文献

-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2009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9)》,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贵生 2006 香港粤语的定位与教学语言问题,两岸四地语文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理工大学。
- 李贵生、梁慧敏 2010 香港工作场所中三语使用的初步调查,《中国语文研究》第29期,97—110页。
- 梁慧敏、李贵生 2012 香港非粤语母语者语言转移的初步探讨,《人文中国学报》第18期,367—400页。
- 香港政府统计处 2011 《二零一一年人口统计》,2014年7月30日,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quicklink/index_tc.jsp.
- 尹海洁、刘耳 2008 《社会统计软件 SPSS 15.0 for Windows 简明教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余民宁 2005 《心理与教育统计学》，台北：三民书局。

祝新华、陈瑞端、温红博 2012 十年间香港大学生普通话水平的发展变化——基于香港理工大学的十年考试数据，《语言文字应用》S1期，58—66页。

Lee, K. S. & Leung, W. M. (李贵生、梁慧敏) 2012. The status of Cantonese in the education policy of Hong Kong. *Multilingual Education*, 2;2: 23.

The Five-Year Review on the Use of Spoken Languages in Hong Kong

Leung Wai-Mun

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recent language survey with the one done five years ago, this paper aims to review and re-examine the language use in Hong Kong us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order to describe how current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are affecting the language use in Hong Kong, our investigation will demonstrate the changing tendency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variables on the frequency of use of the three languages, namely Cantonese, English and Putonghua. In general, th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use of Cantonese declines slightly, while the use of the other two languages shows an opposite pattern. In terms of specific variables, it is interesting to discover that personal and social backgrounds do play a role in some occasions. With the aid of figures and table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noteworthy phenomena which will be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educators and scholars.

Keywords Hong Kong; Cantonese; English; Putonghua; language survey; five-year review

(梁慧敏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